

梁启超的家庭教育

若以结果导向而论,梁启超的家庭堪称是现代家庭教育的传奇:梁启超出身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的寒素之家,他不仅自身成就非凡,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风云人物、学术大师,而且教子有方,“一门三院士,九子皆才俊”传为佳话。1948年中国首次设立院士制度时,梁家的两个儿子思成、思永同时当选,思礼则于1987年、1993年陆续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。甚至,他的弟弟梁启勋、梁启雄和侄子梁廷灿在其引导和指点下也成为了卓有建树的专家、学者。

即使忽略梁启超的教育内容和方式,从他寄给孩子们“超大量书信”中,首先能感受到的是他对子女毫不掩饰的关心与爱。他写给居住在各地的儿女的信仅目前所见就有400多封,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发出,就开始写下一封。信中除了嘘寒问

暖以外,他还不厌其详地与儿女们谈论自己的近况、经历的大小事情、自己的所思所感,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,甚至还不时夹杂着诙谐的玩笑。

所有书信中,梁启超



梁启超与子女思忠、思庄合影。

让女儿梁思顺在日本继续完成学业,自己则归国参与国事。心中感到烦闷时,他常常给思顺写信,表示“若吾爱女在侧,当能令我忘他事”“吾得汝书为惟一乐事”,直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,充满了拳拳父爱。当听说思顺因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太过用功时,他又赶紧写信,告诫其绝不可因欲速以致病,直呼女儿为其命根。

有时候,梁启超也会在信中与思顺开玩笑,有一次他“抱怨”说:“忠忠、庄庄两个天天撒泼,要我带他们逛北戴河……我被他们磨不过,已经答应了……你们这些孩子们,实在难缠,一个个长大了,越发成群结党来打老子主意了,你当老姊姊的都不管管他们吗?”

作为长女,梁思顺的身份是多重的,除了父女关系,她与梁启超更互为精神上的知己。梁启超对女儿的关心直接而热烈,相较之下,他对儿子的关爱则更为深沉。1923年,梁

写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书信最多,他爱称其为“宝贝思顺”“大宝贝”,称次女梁思庄为“小宝贝”——与之对照,儿子梁思成与梁思永则被戏谑地称为“不甚宝贝”,令人忍俊不禁。

1912年,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后,梁启超

思成因车祸住院,梁启超郑重地给他写了一封信,要他利用这段时间,在医院好好诵读经典之书,于忧患中成长。1928年,梁启超曾写信给思成,为其筹划留学回国后的职业,没想到思成回信竟不提及此事,对老父的操心不回应。由于思成已成年,不好直接去信批评,梁启超又写信给思顺,让身为长姊的思顺“责备、教导他一下”,还颇有几分失落地说,“根本就是(思成)来信太少”。

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学者,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对知识性学问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,他让思顺留在日本求学,不但专门为其请了几位家庭教师,学习内容遍涉西方社会学科的主要门类——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,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。

他也注重发挥孩子们“传帮带”的作用,比如在1912年11月9日、10日写给思顺的信中,就特别交代了思顺要监督思成的学业,如有进步,则奖励仿宋本《四书》一部。梁启超常常寻购旧书、字画,一方面自己读赏,一方面作为给

孩子们的礼物和奖励,这也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引导。

如果仅做到了重视知识性学问,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“学校教育的延伸”而已,从书中收录的写给子女的信、教育文章中能够读出的是:他实际上是在借助所有叙述表达的机会,向孩子们传递自己的人生态度、理念,夯实教育的基础“修身”,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气息。

比如,他对子女说:“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,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。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,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,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。”对人格、道德修养的重视使他认为这些乃是“做人的基础”,只有“先打定了”,才能接下来谈做学问。梁启超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修身之道,做到了如是说、如是行,修身即生活即教育。

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,1925~1929年初,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,但笔耕不辍、不时演讲之外,仍主持清华研究院,出

任北京图书馆、京师图书馆馆长,创办司法储才馆等。在此阶段,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,对孩子们总结出了“得做且做”主义:“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,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……我总是抱着‘有一天做一天’的主义(不是‘得过且过’,却是‘得做且做’),所以一样的活泼、愉快。”

梁启超把学术研究也当做修身的途径之一,强调学术的“薰染陶熔”之功,虽然希望子女学有所成,但极力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。他曾经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学习而过于劳累,星期天必须休息,多游戏、多运动。对待在国外留学的梁思成,梁启超也一度担心他“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”,于是致信对他希望思成能像从前一样“活泼有春气”,他就心满意足了。梁启超的家庭教育,可谓一面重视知识性学问,同时又对其可能带来的生命的损耗时刻保持警惕。若引用古来先哲的话,做学问最重优游涵泳,使自得之——这是梁启超对子女在学术研究功夫上的具体指点。(据《文摘报》)

在唐朝,想要出家有多难?

最近一则关于“灵隐寺又招人,全日制本科才能报名”的消息上了热搜。其实早在2016年,灵隐寺的一则招聘启事就吸引了1000多人报名,还一度因太火删除招聘信息。现代社会进入寺庙工作有了多种渠道,那么,古代进入寺庙当和尚有哪些门槛呢?

如今的古装剧里经常有人犯了罪就被强令出家,还常常有犯了法跑到寺庙当和尚就能免被法律处罚的桥段,其实这在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。咱们以唐朝为例来说。

唐朝时候,明令禁止僧尼私自出家的行为,对于未经官方许可而“私入道”的行为,处罚是相当严厉的。《唐律疏议》“私道条”对于私人道僧尼及相关人员都要进行处罚。私人道的僧尼本人及其使人

道之人,都要受到“杖一百”的处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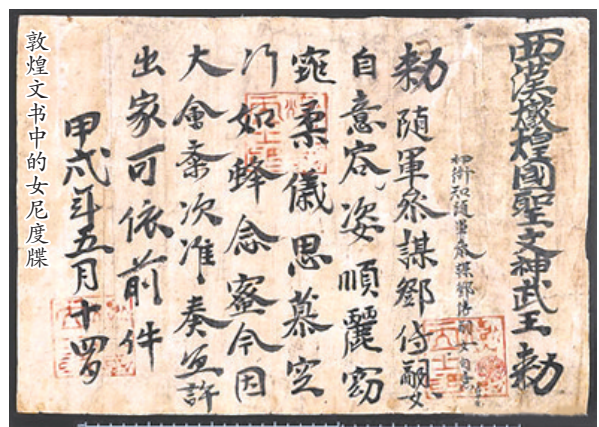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,要想成为一名僧人,需要经过哪些流程呢?先说最普遍的途径,首先要成为一名童行。童行也称为童子、行者,是在未被剃度成沙弥之前,留有长发、居于寺院的发心出家者。在童行阶段,出家者与寺院之间相互了解与适应,进行适当的经法学习,为日后的得度做准备,“念经求度者,温习经业,不得懒惰”,同时也要从事一定的劳动。

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僧人还需经过试经。试经度僧是唐代为控制僧尼人数,禁止私自出家而设立的制度,又称试度,大概开始于唐中宗年间。度僧时,让请求出家者读诵经论,并且陈述其义,类似现在的上岗考试。到了唐代宗年间,国家规定试经者须

经过佛教经律论三科的综合考核才能得度,已不仅仅是背诵经文那么简单。

考试合格者由政府发予度牒,度牒也就相当于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,是政府机构发给道士和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。唐时,度牒由尚书省祠部发行,用“绫素锦素细轴”制作而成,大致与朝廷的诏令文告相类似。度牒上详细记载僧尼的本籍、俗名、年龄、所属寺院、师名等内容,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。有了这份度牒便可随意行走,还获得了免除赋税徭役等特权。

另外,逢皇帝寿辰等重要日子,在皇帝的特别恩许之下,也会给予度僧名额。有名望的高僧也可以向皇帝提出请求,特恩度僧,如玄奘法师就曾为善洛、法通、处严等请求恩



度。还有针对个人的特别恩度,窥基就是在唐太宗的许可下,成为玄奘的弟子。

试经、特恩之外还有一种特殊度僧方式,称为“进纳度僧”,又称纳金度僧、卖度。卖度成为一种制度始于唐肃宗时。事实上,这种办法在肃宗即位之前就已开始。安史之乱爆发后,宰相杨国忠献策,让御史崔去河东收钱度僧尼

道士,结果很快就得钱百万。后来唐肃宗在彭原郡时因“军兴用度不足”,也通过贩卖度牒的方式来筹钱。此后,这种卖度的方法推广到各地,正式以纳钱度僧尼作为朝廷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措施之一。

通常情况下,祠部颁发的都是已记录剃度者信息的实名度牒。而空名敕牒是指未填剃度者信息的空白度牒,这种度牒就可

以由买主随便填写。“空名度牒”实际上已经为纳钱度僧留下了隐患。尽管唐朝后期朝廷开始逐渐滥发度牒,但此时度牒发行手续仍然比较复杂,和后来宋朝时的度牒经济规模相比,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。

以上说的这些流程都是基于当时的朝廷对寺院经济有良好的管控制,如果碰上战乱时期,就会容易得多。唐朝著名宰相上官仪就曾自行剃度。上官仪的父亲曾经是隋朝江都宫的副总监,但是其父亲在江都之变时被杀,当时上官仪还很小,为了躲避叛军的追捕,就进了寺院做了和尚。战乱之下,叛军根本无暇前去搜捕他,就这样上官仪在寺庙里得以安身。后来他发奋读书,在贞观年间考中进士,最后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